

## 第八章 积极反共,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阎锡山对共产党的仇视可谓根深蒂固，不但反共态度坚决，而且反共手法多样，手段毒辣。为了反共，他文武并用，既向中共发动军事进攻，又对中共展开“理论围剿”，几至无所不用其极。在抗战期间，阎锡山始终与中国共产党貌合神离，甚至公然打出反共大旗，制造摩擦，大打出手破坏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日交战方酣的1939年，他就悍然发动了晋西事变；抗战胜利后，更是无所顾忌，开展了更为频繁的反共活动。

266

### 一 为了反共,大搞伪“理论研究”

我从1931年就参加了阎锡山理论研究的的活动，直至1935年公开发表。

阎锡山把他的反共防共言行，用理论、学说等名词伪装起来，用理论、学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企图遂其反共防共的阴谋，所以我现在用伪“理论”称之。

## 大连回来

阎锡山在1930年（民国19年）军阀大混战败逃大连，他的日记上有一段：“一个人从高山上掉到万丈深沟里，身体摔得粉碎，此时还有什么？还想什么？”阎锡山在大连的确想了一想。想清楚了10年以内，在政治上不能跟蒋介石争雄。人民起来大革命，他们都是革命的对象。因此从大连回山西后，口号是“十年建设”，企图造就经济割据。

1931年秋，阎锡山由大连回来，住在五台县河边村。李冠洋（阎锡山前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行营党务组组长）和洪本桑（字亦民，湖南长沙人）、朱鸿达（字光一，云南昆明人）、高仁甫（云南人）、张瑜（字子佩，绥远丰镇人），由北平到河边，住在“川至中学”，每天和阎锡山开会研讨。开始是审查新村制度草案，经过三个多月的讨论，修正补充了一些。这个新村制度是阎锡山土地村公有的初步设计。后来在绥远包头，建立了个新村，名叫“求对村”，就是这个新村制度的实验区。

阎锡山很清楚，常说：“农民不组织起来，是个空子；组织起来，是个乱子。”新村制度就是想堵这个空子，想防这个乱子的。当时，印有一本小册子。

在审查新村制度草案快完的时候，阎锡山提出“人群合理”的组织问题，讨论以后，要写作新村制度的序言。阎锡山说：“现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可是怎样才是人群的合理组织，他也没有个具体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费了很多时间，谈了许多问题，结果新村制度的序言还是没有定稿。新村制度没有序言也付印了。

在“人群合理”的组织问题讨论过程中，谈到中国文化问题，阎锡山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

文化的精髓。”谈到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他就说：“耕者有其田，工者就有其器。”是反问的口气，不是肯定的态度。谈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共产主义不能说它没有可能，但看不见它何时可能。”正如佛家教人成佛，人里头有成佛的，但不能人人都成佛。儒家教人成圣贤，人里头有成圣贤的，但不能人人都成圣贤。‘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只能教育人这样做，不能强迫人这样做；只能奖励人这样做，不能限制人这样做。”谈到现社会的问题，他说：“现社会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它的病根有二，一是私资生息，二是金银代值。”按劳分配和物产证券就是从这两个问题开始研究的（下文另述）。

在会议上，阎锡山常讲“中”。我个人感觉是儒家的老一套。可是每天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我们提的意见，他总是用两句话回答，一句是“你说得好”，一句是“你说得对”。说好的不采纳，说对的采纳。日子久了，我们大家有个同感，原来，好并不等于对呀。

阎锡山有他的一种说法。他说：“对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对在不对的中间，不在不对的反面；不对的反面，还是个不对，不对与不对是相对的。不及一分是不对，过一分也是不对；偏右一分不对，偏左一分也不对。只是过一分的不对，是好一方面的不对，不及一分的不对，是坏一方面的不对。过犹不及，其错则一。偏与倚，过与不及，都是不对。惟‘中’与对是绝对的。”他说你好，就是说你过了，是好一方面的不对。所以在阎锡山说来，好不是对。

阎锡山把“中”当作衡量是非对错的标准来运用，谈话中经常流露这种口气。所谓“中的哲学”也是其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不浪费笔墨，用问答方式，概要地略述一下：

问：“中”在哪里？

答：中就在事事物物之中。

问：如何识得这个“中”？

答：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便是“中”。

问：“中”在事物中起什么作用？

答：事物得“中”则生，失“中”则死；得“中”则存，失“中”则灭；得“中”则成，失“中”则毁；得“中”则治，失“中”则乱；得“中”则胜，失“中”则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放之四海而皆准，置诸万代而不变。

问：如何掌握这个“中”？

答：叩其两端，而用其“中”。

问：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中”是不是变化的？

答：事物是时变的，万变的，“中”是不变的，但不能执中，要求时中。

问：执中与时中怎样分辨？

答：离开事物讲“中”，就是执中；针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讲“中”，就是时中。

问：“中”与对有没有分别？

答：“中”是理之极则，对是事之极则。说理要“中”，做事要对，“中”与对都是绝对的，二者二而一，一而二。

问：怎样叩其两端而用其“中”呢？

答：弃其相对，取其绝对，但折中是不对的。

问：事物内部的矛盾是绝对的，并且是自始至终贯穿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的。取其绝对，是否掌握矛盾？

答：事物的矛盾是相对的，暂时的；事物的统一是绝对的，惟一的。分析问题，分析矛盾；解决问题，把握统一。

问：万变的事事物物中，会有不变的东西吗？

答：事物是时变的，万变的，但万变之中，却有个不变的。

画定一个范围，就有一个母理，母理就是不变的。如：人以生为母理，国以治为母理，立法以平为母理，交友以敬为母理……都是不变的。子理是时变的。如：中国人以男女授受不亲为敬，西洋人以握手接吻为敬，行敬不同，敬爱则一。

问：母理与子理怎样关系？

答：母理是规范子理的，子理是适应母理而变的，子理不能不变，但不是乱变。

问：哲学上，不是唯心，就是唯物。咱是唯心？还是唯物？

答：唯心偏，唯物也偏。落了物的心，等于腐物的微菌；摺了心的物，就是毒害人的蛇蝎。咱不唯心，也不唯物，咱是唯中。

阎锡山打着中国文化的招牌，利用孔子的偶像，伪装出一套中的哲学来，却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反。

从我们到河边至 1932 年夏，谈的问题相当广泛，概括地说，是想中国文化要现代化，民生主义要具体化，共产主义要中国化。而阎锡山所以谈这些问题，是想用中国文化现代化，民生主义具体化为手段，把共产主义中国化，不要共产主义化中国。简单一句话，要化赤，不要赤化。

### 理论研究会的成立

1932 年秋，阎锡山成立了理论研究会。李冠洋是主任委员，洪亦民、朱光一、高仁甫、张子佩是委员，还有些兼任委员。内部编制，委员没限额，有秘书、书记、办事员等。地址在太原市精营西二道街 81 号，没有挂牌子。理论研究会是个研究机关，

是为研究按劳分配物产证券而成立的。这时阎锡山又作了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很忙。规定每周开会一次，他忙了，会就不开了。委员们研究讨论，结论送阅。阎锡山回河边，委员们随着去河边，紧张一个时期，回来研究整理，这样继续了很长时间。

理论研究会的人员因工作关系，可以谈共产主义的问题，可以看马列主义的书籍。别人不容易看到的书，这里是在书架上摆着。当时有的委员就在家翻译《资本论》，也有的编写政治经济学。但也有人研究马列主义，不是为研究马列主义而研究马列主义，而是为反对马列主义而研究马列主义。我记得当时有两个人研究马列主义，到太原住了不久就走了。有人说：“他们是托派理论。”阎锡山答得很干脆，“托派的说法，咱也听听。”阎锡山的态度如此，其他人员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从1931年到1935年四年多的时间里，参加研究讨论的人逐年增加。有的是在太原大专学校教书的，有的是各机关部门和团体负责的，也有国内的学者、教授和进步人士来参加的。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温健公等都先后到太原，参加研究。

侯外庐到太原后，我们一同去河边。每天同阎锡山开会，整整研讨了一个礼拜，侯外庐跟他谈了一个礼拜的剩余价值。在这以前，阎锡山坚决地认定现社会的病根是私资生息和金银代值，并且强调生息这一面，他曾举例说：“宋朝时期，一文制钱放出去，三分行息，子母相生，到现在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三周。”经过这次会议，他感觉到只说病在生息，不说病在私有是不够的。公有私有的问题，他开始考虑了。接着就是阎锡山的庐墓时期。

阎锡山守制百日，召集了个扩大的理论研究会，内有进步人士参加。经常有二三十人住在河边，每天开会讨论，整整100多天，按劳分配、物产证券基本上定稿了。

经过这次会议，理论本身迈进了一步。把现社会的两大病根，即私资生息和金银代值，修改为资私有和金代值。以前只说病在生息，不说病在私有；只反对私资生息，不反对资产私有。现在肯定资产私有是现社会的病根了，根本问题上有了修改，我们不能不说是前进一步。可是阎锡山又有一套说法，他说：“生产资料是资，生活资料是产。资供生产，应归公有；产供生活，仍应私有。资本主义病在资私有，不病在产私有；共产主义不病在资公有，却病在产公有。按劳分配是资公有、产私有的社会制度，既利生产又利生活，是人类合理的社会制度。”并且更进一步把按劳分配强调为人类的永久社会制度。他说：“好逸恶劳，好多恶少，好美恶劣，人之常情。按劳分配，按劳动定享有，以享有定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巧的巧劳，照巧享有，笨的笨劳，照笨享有。以其享受上之所好，励共劳动上之所恶。适于生产，便于分配，利于生活，人人能行，时时可行。按劳分配是劳享一致的社会制度，是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类永久的社会制度。”所以这次会议上只确定了个资公有产私有的按劳分配。

272 “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到来”。这两句话，自1931年到1935年，不只一个人跟他谈，也不只谈一次。阎锡山始终顽固地认定“共产主义是有其理而无其事”。并且武断地说：“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作号召，他不能放弃共产主义；放弃共产主义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假如仅以此为号召，其祸人类犹小，若强行之，其祸人类必矣。”

庐墓时期后，我把讨论修改以后的稿本交理论研究会书记郭子怡刻印。我说：“再刻一次吧，下次可能铅印。”他笑着说：“非刻过40次不可。”我问这是多少次了？“39次了”，他答。按劳分配物产证券的讨论稿开始就是由他蜡刻油印的。几年来，讨

论一个时期，修改一次，刻印一次。一次比一次页数多，尤其是这次最多。果然，后来又作了两次补充，又作了一次文字修改，整整42次，才铅印出一本按劳分配物产证券。每次讨论修改的底稿，均存理论研究会。抗日期间失散了。

### 公开发表以后

1935年秋，按劳分配物产证券理论公开发表，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有批评的，有赞成的，有提问题讨论的，有提意见补充的。也有山西的留美学生从美国写信回来说，美国人赞成物产证券，不赞成按劳分配。也有山西的留日学生从日本写信回来说，日本有人赞成按劳分配不赞成物产证券。还有来太原同阎锡山面谈的。经过一年多的公开讨论，又编印了一本按劳分配、物产证券讨论集。

按劳分配物产证券简称物劳学说，一般也叫阎锡山的理论，它是以理论、学说的面貌出现的。可是阎锡山在会后说：“政治是一种技术。咱的物产证券就是嘴吹大洋。”1936年以后，他把按劳分配喻作电鞭，说：“按劳分配就是一支电鞭，电鞭在手，就可玩虎。”按劳分配物产证券，在阎锡山的心目中，是别有想法和看法的。

1935年，南京政府公布法币。阎锡山在太原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发表告商民书，收货发券。当时是省钞，发一元省钞，收一元货物。

有人问，物产证券与法币是不是一样？回答是根本不一样。物产证券是以实物为担保，政府发券收货。发一券就有一物，券就等于百货的价值收条。有多少货，政府才能发多少券；发多少券，政府就有多少货的准备。法币仍以金银为担保，发多了则准备不够。物产证券发得越多是社会上的生产越富，它俩本质不同。



1936年，山西全省进入防共时期。阎锡山发表了一篇《防共应先知共》的文章，印有小册子。另有《共产主义的错误》这本小册子，也是这个时期编印的。在编写这本小册子的会议上，他说：“按劳分配就是大同社会。”特别强调按劳分配的永久性。对共产主义又作了一番歪曲和诬蔑。阎锡山说：“我是现代政治上的一个负责人，跟100多年以前的一个学者，没有什么争辩的必要，只是为了人类的命运，不得不说一说。”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真如在显微镜下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看得是明明白白，分析得清清楚楚，说的是百分之九十九对啦。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剩余、经济恐慌，认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造成的分配病。其实这是个交易病，不是分配病。马克思把交易病认成分配病，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到来。”

“资本主义不是必然崩溃，而是该崩溃。假如资本主义国家废除金代值，实行物产证券，把实物为一层而代值之金银又为一层的二层物产制改为一层物产制。政府发券收货，人民凭券兑物。物产证券是百货的价值收条，有多少货，可以发多少券。政府就有力量接受人民的物产，就能把工厂仓库的产品，移至市场仓库，问题就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不见得是必崩溃。咱的物产证券就是资本主义的续命汤。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人剥削人，应该反对它，推翻它，所以资本主义是该崩溃。”

“共产主义也不是必然到来。我们虽不能说它没有可能，但看不见它何时可能。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定成制度。欲人人劳动上不计多少，在享受上不计好坏。各尽所能，尽能很难；各取所需，取需很险。共产主义是有其理而无其事，若强行之，其祸人类必矣。”这套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显得振振有词。

（张子佩）

## 二 猝不及防伸出黑手,发动晋西事变

1939年冬,山西吕梁山上,原来由进步青年建立起来的青年抗日决死队,奋起反抗阎锡山顽固派的压迫,宣告起义。这一次起义就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受到人民反击的“晋西事变”。兹就所知叙述如下:

### (一)

阎锡山在西安事变后,曾伪装进步,标榜“迎共抗日”,取消了“防共保卫团”名义,改为新编团,从事扩军。但作为封建反动中心组织的“公道团”依然保留,而且扩大公道团的青年部,指定心腹特务头子梁敦厚(化之)领导。时又招致平津进步青年,并由薄一波任青年部主任。薄当即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在山西境内发展基层组织,形成进步势力,与公道团相对立。1937年“七七事变”后,牺盟组织日见壮大。

日军进犯山西,大同、平型关、雁门关相继失守。阎系的旧行政官吏闻风逃避,地方公道团也烟消云散。这时各地的“牺盟”会员,奋勇跃起,成立新的行政组织,实践“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屹立敌后,坚决抗战,阻止了日军的深入。阎锡山看到沦陷区不断扩大,对于地方行政的维护与监督,不得不寄托于坚强站在敌前敌后的牺盟中坚下部来分区领导,于是建立了七个新的行政专员区,任薄一波、宋绍文、张文昂、戎伍胜等为专员

忻口失守,太原接着沦陷,阎的基本部队晋绥军大部溃不成军,阎本人逃到晋南临汾。只有七个新成立的牺盟领导行政区动员民众,收容溃军,同时组织了20多团的青年抗日决死队,每团达到2000多人。这样才箝住日军,使阎的旧军政集团安全退

到晋南，重整部队。

阎锡山退到临汾后更无心抗战，转而害怕人民进步力量的发展。1937年冬，在临汾的温泉村举行了一个多月的新旧军政人员会议，强调“统一领导，创造新的组织”。随即组织所谓“民族革命同志会”，表面要把公道团和牺盟统一起来，实际是想消灭牺盟的组织。同时开办所谓“民族革命大学”，将各方投奔到晋的青年学生集中起来，目的在为公道团培养干部，夺取牺盟建立的新政权。在军队方面，把青年抗日决死队改称新军，编为四个纵队，派旧军中的少将级军官陈光斗、鲁英麟、梁浩等为纵队长。同时在临汾土门镇成立所谓“新军教导团”，借口为新军培养有政治素养的军事技术新干部；其实是集中一批顽固的下级军官和搜罗一些落后青年加以训练，伪装进步，企图打入各决死队腐蚀新军，伺机发动内变。主持这个教导团政治工作的依然是梁化之，主持军事训练的是阎的卫队旅旅长杜春沂。这一切反动措施都是想并新于旧，消灭进步力量，积极保持阎锡山的封建统治。

临汾失陷，阎锡山再逃到吕梁山西南隅的占县，旧军政力量更显颓败。新的牺盟政权和新军却日益壮大，新军和新行政区的保卫团，达到40余团。阎锡山自然大感不安，大叫大喊什么“新的存在，旧必灭亡”，鼓动旧军政顽固分子，掀起“变新运动”，进行消灭新军和牺盟的阴谋。

这时阎系旧晋绥军全部退缩到吕梁山里，而以牺盟新军在外围掩护。旧军实际仅余十九军、三十五军、六十一军、骑兵军和郭宗汾、杜春沂两个独立师和一个所谓教导师。其余尽是虚设番号，所谓四个集团军都是虚构的名义。经过日军的几度扫荡进攻，旧晋绥军日形萎靡。自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从河曲去绥西，脱离阎系以后，阎锡山感到他的势力日益孤单，就急于要吞并新军

来支撑起四个集团军的局面。还在1938年秋，阎锡山侦知日军将再犯吕梁山消息，他就趁此机会要求新军统一行动，适时配合“正规军”作战。他命他的副长官杨爱源为新军总指挥，设总指挥部于大宁县城，升新军第一纵队纵队长陈光斗为指挥官，任梁化之为政治委员。用“统一行动，争取胜利”作幌子，企图控制新军，使其逐步脱离牺盟的领导。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把他的亲信十九军军长王靖国调到占县轮流开办“集训团”加强对新旧军的各级军政干部的训练。阎亦日夕亲自训话，讲“物劳主义”、“民族革命组织”、“变新运动”和“新战法”等等，以“促进进步、统一认识”做幌子，极力鼓动旧军干部反对新军，并且勾搭新军的若干落后分子，准备做瓦解新军的工作。这样的训练办了几期（每期三星期）。到了冬天，由于日寇的扫荡遇到人民抗日武装的反扫荡，占县、乡宁地区暂告安定，阎锡山进行瓦解新军的阴谋计划亦准备完成，于是他在陕北宜川县的秋林镇召开军政大会，凡县长以上、师长以上的文武官员和各级政治委员，一律被召出席，远至重庆、西安方面亦派代表参加。会议拖延达三个月之久，为的是使牺盟、新军主要干部离开所属，让梁化之、王靖国所唆使而打入新军的反动分子有充分时间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的阴谋活动。因此会议之初不过是泛泛讨论些问题，敷衍过去。及到进入讨论军事方面的问题时，突然提出所谓“统一方案”。这方案包括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与待遇等规程。这个方案的实质，就是并新军于旧军，也就是要消灭新军。阎的总部参谋、军务两处已在拟订方案实施后如何以旧军为基于编入新军，完成集团军系统的计划。当时阎部的四个集团军总司令，除了陈长捷的第六集团军尚统辖六十一军和杜春沂独立师扩称为军的两军外，其他如王靖国、赵承绶的第十三和第七集团军只是他们所统率的十九军

和骑兵军一个军；至于孙楚的第八集团军，竟是空头，连一个师的部队也没有。所以各旧军将领就特别支持这个阴谋计划，强调应立即实现，早日抓到新军部队。同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也有了阴谋计划：要消化“牺盟”于“民族革命同志会”之内，要限制“牺盟”领导在新行政区的权力；因而设立所谓“省政府行署”四个，划全省为四区，由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兼任行署主任，实现组、政、军一体化的反动措施。当时牺盟各主要干部都出席开会，他们为了团结抗日，在会内会外尽力耐心陈说，但无法消除阎锡山吞并新军、消灭进步力量的野心。面临到最严重时刻，新军第二纵队长韩钧和第七新行政区专员张文昂便在隰县义棠镇率队誓师起义，号召各新军和“牺盟”一起宣告脱离阎锡山统辖，坚决抗日到底。阎则悍然以武力对待，命令十九军和六十一军发动对蒲隰地区的起义新军进攻。事变就扩大到临县、兴县方面。

## (二)

278 当时阎属的所谓“正规军”都在晋西，骑兵军（赵承绶）在兴县、岢岚，郭宗汾独立师（属赵承绶集团军）在临县，十九军（王靖国）在石楼、中阳、隰县、永和地区，六十一军（吕瑞英）和杜春沂独立师（都属陈长捷集团军）在临汾、蒲县、吉县、大宁地区，彭毓斌教导师在乡宁地区。起义的新军韩钧和第七行政区专员张文昂所领导的决死第二纵队以及专区的保卫团队，处在隰县东区、洪赵西北区和汾西西区间旧军的重重包围里面。其他新军各纵队在汾河东和太行、五台山区，都被日军的封锁线所间隔，无从相互策援。在新军内部，阎锡山自以为已有安排，必起内变，只要一经进军压迫，就可以把起义新军囊括捕捉。但阎又深有顾忌，认为陕北八路军可能过河支援起义军，因此严督六十一军要赶紧进攻，并命十九军和兴临方面的赵、郭军准备应付陕

北的动态。

事先，阎锡山得到梁化之（兼新军总指挥部的政治主任）的密报，知道韩钧、张文昂在酝酿起义，已命令参谋处拟出讨伐计划，采取层层围击，并密令各旧军遵照。计划要点如次：

（一）赵（骑兵军）郭（独立师）两部于临县集结，监视陕北方面，并准备迎击起义军的北撤，防止其进入兴临地区。

（二）十九军主力于石楼、永和监视陕北，一部于中阳北的“军、汾日寇封锁线”南，准备拦击先期北撤的起义军，并适时协助北进的六十一军对起义新军进行围击。

（三）六十一军，附以教导师续汝霖旅，为进击起义新军的主力军，向蒲隰以北地区，联系十九军，对隰东、汾西间的起义新军实行围击。

当韩钧、张文昂于义棠镇誓师起义时，阎即电令各部队发动进攻。那时王靖国和梁化之尚在秋林阎处，主持督令各部队的进军和策动各新军内部预谋的瓦解工作。十九军是由副军长梁培璜在永和军部负责指挥。他以史泽波旅（独立旅三团制，等于师）从军汾线南下，向中阳城北区活动。军主力的两个师集结于隰县、石楼间和六十一军联系，主要为对陕北方面戒备。

六十一军从乡宁道中折回吉县，军长吕瑞英先驰赴土门部署七十二师和二〇八旅的前进。我从乡宁赶回吉县桑峨村，以第六集团军名义指挥各部，策定计划，企图在隰县东方、汾西西方，义棠、中阳的山隘间围歼起义新军。

进军大约在1939年12月上旬开始到年底就结束，并各复员于原来驻地。

进攻主力六十一军秘密前进相当迅速，但右纵队（七十二师）一路跋涉山区小径，没有摸到新军踪影，左纵队（二零八旅）于越过蒲北山地中，遭到来自义棠的新军逆击，展开一日的

激烈战斗。吕瑞英以为捕捉到了新军所在，就加上军预备队高翹团，并命右纵队向左旋转进行右包抄的围击，待拂晓展开并进：不料新军已乘夜北撤，不知去向。吕瑞英复按原计划，向中阳以北线上进行追击；及到中阳和十九军南来的史泽波部会合时，知道起义军同七专区各牺盟组织、行政人员等都已越过军汾日军封锁线进于临县地区了。六十一军就停止于中阳南地区，但尚拟在陕北没有动静的情況下，策动再一跃进，想越过军汾线和临县的赵郭军合力攻击该区的新军各部。部队正在等待阎的启命，到1940年1月上旬，阎锡山忽然变计，突然严令六十一军和续旅克期分别还到原驻地。

六十一军从抗战以来在阎军中是被称为劲旅的，人数充实，武器好，轻重机枪和炮数均多；且在蒲隰中阳一带曾和日寇数度作战，对该地区地形相当熟悉。进军到隰东虽已张开包抄形势，但未能捕捉新军。七十二师、续旅和东翼支队等都等于白跑长途，未得参与战斗。仅二零八旅和独立骑兵连于蒲北、隰东和新军一部激战了一日夜，伤亡了50余兵员，散失了百余人；那一阵战斗据说是激烈的，新军亦有相当伤亡。但是，新军有牺盟的正确领导，是人民的部队，处处有人民的支援，耳目灵敏，运动轻捷，所有伤患者都经人民妥当掩护起来。正义谁属，人心向背，明若指掌。阎锡山土皇帝统治的反动性，至此又得一明确证验。

十九军方面，所谓戒备陕北八路军的东击，根本上是见鬼自悻。两个师在隰县、永和间自扰了一场，只是史泽波独立旅从临县南来到中阳北区，想截击新军，却遭到起义军主力北进中的反截击。十九军部队是有名的豆腐军，经不起意外的一棒，竟溃灭了一营多。这一影响使阎旧军对新军的战斗力由原来的轻视转而戒惧起来。

当六十一军离开吉县向蒲北前进时，在乡宁已南出进击日军于稷王山的胡宗南属李文九十军也调头回到乡宁，且依胡宗南的指令，以支援“讨伐叛军”和对临汾日寇的戒备为名，续向吉县移动。反动派是尔虞我诈的，阎为此踌躇顾忌，就令十九和六十一两军停止于中阳、离石一带，以观望形势。

在军汾线以北兴县、临县方面的赵、郭两军，受到阎的密旨，先以赵承绶出面，装做调处姿态，和在该区的新军、牺盟并各进步抗日的军政组织如续范亭等会谈于兴县的白文镇。他们把这一事变说成是局部的新、旧军摩擦，为阎的阴谋掩饰；暗中集结部队以监视在晋西北的八路军贺龙部队，并牵制该地区的新军，使之不能支援隰县方面的起义军。当蒲汾起义新军北移越过军汾线到临县地区时，阎曾令赵、郭军相机狙击。但是，他们鉴于史旅的受创和当地人民的力量，使观望不前，莫敢下手。两部主力都退到临县城附近，在城周做起工事，从事屯粮，守御待援，不久就受到新军的联合围击。

### (三)

阎锡山惯于玩弄所谓“守点攻击战法”。参谋处已作出以十九军、六十一军越过军汾线会合赵、郭两部消灭新军于临县城附近的计划，而阎锡山却惴惴于胡宗南的趁机相迫，修改了这个计划：要胡部的李文九十军开进石楼方面和六十一军会合，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统一指挥，北进临县。因此与胡宗南商议，而胡更其狡猾，表示同意此项计划，但要再派两个军过河进入阎区来接代六十一军的原防地，理由是为了加强李、陈军的后方，防备日军乘机入侵。这显然是要动摇阎锡山的立脚根本。于是阎锡山决定放弃兴临地区，突命赵、郭军立即南撤；并命六十一军等部克日返原防地。这样就阻止了李文军的北展。



赵、郭军正在临县严阵待援，突然接到南撤命令莫名玄虚；在仓皇夺路中，受到新军的追击和地方民众的威胁，越过军汾线时，已纷溃不堪，骑兵军竟自相惊扰，完全瓦解。赵承绶所兼管的省府第三行署各员属，山西省银行分部金柜，以及赵的妻子等等都丢失了。赵只身跣足逃到中阳山头，不禁北望雪涕。郭军亦有半数以上的重大散亡。这两个部队以后跑到隰县才勉强收容起来。

在汾、隰的起义新军是决死第二、四两纵队和两个政治保卫团，总共八几个团，人数较多，每团约二千三四百人；装备差，政工人员多，步枪每团只有六七百枝，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只决死队有一些，为数很少；但是战士的政治觉悟高，作战勇锐，行动轻快。起义军的全部作战人员约万余，相等于六十一军加以续旅的兵员人数，但火力相差很远，不宜于作胶着的持久战；且处于各反动旧军的层层包围形势下，必须早行转移，免陷于孤立受击。所以起义军放弃第七专区，只留一部分逆击向义棠急进的六十一军，以掩护其主力同七专区署、牺盟组织干部等从汾西外线向兴临地区绕路北撤。在主力北撤中，先就地解决了在该区的上靖国、郭宗汾所属的各一个补充营。（这是个破烂营，抽出从事补充的；进入接近汾西方面的进步抗战区，一面是为了发动补充兵缺，一面暗中窥伺新军，作离间和情报的勾当。）又于经过中阳北区时，对从事拦截的十九军史旅进行了反截击而安全度越日军的军汾封锁线；到达兴临地区时，联系上那里的新军，得到了立脚点，安定下来。于是大力展开宣传工作，使阎锡山的全盘阴谋大白于天下；同时动员民众起来对集结于临县抢夺民粮的顽固军赵、郭两部加以围困，迫使赵、郭军动摇南撤，在南撤中又猛力追歼。经一个月的时间，全部肃清了兴临地区阎锡山多年压在人民头上的反动封建势力，建立起民主新政权，继续抗日。

王靖国秘密进行从内部瓦解新军的勾搭只有鲁英麟一个团被游离出来，其中也只有极少数的落后分子附和了鲁的行动，绝大多数人员在发觉了鲁英麟的阴谋骗局以后，也都走向兴临方面去了。

事变虽在晋西的汾西、隰县地区发动，立时全晋各地的牺盟、新军都一致揭穿阎锡山制造事变的阴谋，为起义军声援，截断阎锡山、梁化之的特务魔爪，明确宣告脱离阎锡山的一切关系，更坚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牺盟虽然失掉第七行政地区，而把赵、郭军和所谓“山西省府第三行署”等反动势力，驱逐出兴临地区，使晋西北地区建立起稳固的且和陕北联成一片的进步抗日根据地，并有利于和冀察以及太行山区的八路军很好地联系策应，大大增强了抗战的力量和作用。

牺盟干部如刘岱峰等曾经常在阎锡山总部诱导阎锡山走“联共抗日团结进步”的路线，在牺盟揭开阎的顽固反动阴谋时就离开梁化之的监视，走向陕北。牺盟、新军经过一场大斗争，从此益加进步，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为抗日民族革命和人民民主革命贡献了力量。

(陈长捷)

### 三 “以共产党之道，还治共产党之身”

阎锡山在山西坐了38年不倒翁，凭的是天时、地利、人诡，他所领导的反动事业不仅有主义、有纲领、有政策，而且施用了不少花招。利用中共的某些办法来对付中共，也是阎及其幕僚惯用的花招之一。阎认为蒋介石国民党过于古董陈旧，腐败无能，根本不能接受民众，不能适应潮流。而中共有生气，办法多，善于革新创造，能够吸引和掌握群众，只有利用中共的某些办法，

才能有效地和中共较量，开创局面，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抗战前夕，阎已逐步实行了从“拥蒋反共”到“联共抗日”的策略转变，他利用中共的办法处理政务也似乎名正言顺，有了路线依据，因而从这时候至晋西事变这段时间里，阎锡山利用中共的办法，主要采取抄袭、剽窃与模仿套用的手法。

首先，阎锡山在炮制他的哲学和主义方面，对中共和联共的理论进行了剽窃。中共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阎锡山标榜的是“中的哲学”。阎锡山和他手下的理论家李冠洋、刘杰、邓励豪、张一善等人，曾呕心沥血地推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矛盾统一律，宣扬他的这个“中”不是骑墙，不是折中，绝不同于“二元论”，而是“不偏不倚”，无比正确，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万变不离其宗，掌握了这个“中”，就能“以不变应万变”，在矛盾中求“存在”，这个“中”就是他“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这个基本观点的哲学依据。也恰好反映了阎骑墙观风、各方应付的阶级本性。阎锡山所标榜实行的政治主张（实即主义）是“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更是对共产党理论的赤裸裸的抄袭。他和他手下几个所谓的理论家剽窃了苏联“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并且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阎锡山承认社会上的“不平等”，只是他的提法又同中共理论有别，中共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治阶级是地主买办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是工农劳苦大众、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阎锡山是把现社会表现的不平等及其根源笼统归纳为“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智诈愚”，并且还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一类的话来形容地主与雇农的贫富悬殊和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中共认为以产业工人为代表的工业无产阶级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和最彻底的革命动力，阎锡山则主张“劳动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

共称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对抗阶级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阎锡山及其理论家则称谓无资阶级和有资阶级，他们咬文嚼字地说，区别这两个阶级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为依据的，因而称有资阶级与无资阶级比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符合实际。中共的革命方针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阎锡山则夸耀他的“物劳主义”可将经济问题与土地问题并为一谈而处理，能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熔一炉而解决。可笑的是，阎锡山及其理论家剽窃了共产党的理论，却大言不惭地造谣说斯大林（在1920年至1929年间）屡次阐述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抄袭了阎锡山（从1930年冬通电下野在大连期间才开始研究的“物劳学说”、“劳资合一”问题）的理论。

山西自民国以来一直处在晋系军阀阎锡山的统治之下，阎在军阀混战期间骑墙观风，各方应付，在矛盾中求存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自阎1935年中共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以后，山西的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在阎锡山集团内部也听到赞成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呼声。阎锡山深感不组织群众是个空子，组织起来又是个乱子，就想利用中共的办法，缓和同群众的矛盾，于是接受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与中共合作进行抗日，于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一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阎让他的亲信梁化之充当与中共合作抗日的代表并担任牺盟会领导，而由共产党人薄一波负实际领导责任。与此同时，还相继成立了“军政训练班”、“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有计划地培养了一批军事、政工、组织、民运工作干部。阎锡山模仿中共“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的方针，于1936年秋提出了“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的口号，在山西各地开展了组训与武装民众的工作。1937年春，日军大批调往华北，绥东百灵

卢沟桥抗战发生，山西处于国防前线，阎锡山面对中共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动，也在标榜：“主张公道，牺牲救国”，“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迎头赶上现代化国家”，“组训民众，武装民众，准备抗战，复兴民族”，摆出一副要坚决抗战的姿态”。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于八九月间大举进犯山西，八路军总部统率所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浩荡入晋，以山西为中心进行抗日，深入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国民党部队在正面战场作战中，尽管付出了重大代价和牺牲，仍不能阻挡日军的攻势，阎锡山看到了旧军的弱点，研究了中共“党指挥枪”的办法与经验，得出“军官能力的军队不如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不如主义能力的军队”的结论，而于部署保卫太原的同时，依靠在山西做抗日救亡工作的共产党人，正式筹建了“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支新军。所谓新军，就因它是用牺盟的宗旨和任务武装起来的、有“主义能力”的人民武装。11月8日，太原失陷，山西军、政部门撤至临汾。阎表示要坚持抗战，他仿照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仿照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11月12日，中共主席毛泽东发表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内中提出建立新军和改造旧军，是使抗日战场出现转机、转入战略反攻的军事基础。阎锡山为形势所逼，颇为重视新军的建设，仿照八路军的建军做法，在新军中普遍建立了政委制，并依靠共产党人为新军培养出大批政工干部。当时，延安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学府叫“抗大”（抗日军政大学），阎锡山在临汾也成立了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学府叫“民大”（民族革命大学），连他亲自发起成立的统一领导二战区军政民各部门的权力组织“同志会”也贴上了“民族革命”的标签。在此前后，牺盟会内成立的干部组

织叫“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同志会内成立的干部组织叫“民族革命同志会先锋队（简称“民先”），均以民族革命命名。此外，还有民族革命通讯社……等等，一时掀起一股“民族革命热”。1938年春临汾失守以后，阎锡山集团先后撤退至黄河两岸的宜川和吉县，首脑部先后驻于秋林和克难坡，但牺盟会和新军都转战活跃于敌后。当时牺盟会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县政权，新军则发展到40个团十来万人，担负起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任，支持了山西的抗日局面，被国人誉为“敌后抗战楷模”，这是阎锡山利用中共的人和中共的办法取得的“收获”。阎一到秋林、克难坡，就仿照中共政治中心延安的装饰，在山头或沟内打了一层层、一排排窑洞，修食堂，盖舞台，建礼堂，兴水电，秋林、克难坡的夜景也颇像是个小延安。延安办起一个“马列学院”，旨在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阎也办起一个“理论研究院”（民族革命理论实施研究院），专门负责炮制和发展他的“物劳学说”，还培养出一批“理宣”干部。中共历来支持妇女解放运动，鼓励妇女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延安街头有成群结队的“女兵”（女干部、女学生、女战士）；阎也标榜提高妇女的地位，布置各校招收一部分女生，培养女干部，在秋林、克难坡街头，不乏身着戎装的“女兵”。边区为了自力更生，维持正常的金融活动，公开发行有边币；阎也自印省钞，控制阎管区的生产和流通。延安提倡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作风，阎也要求禁绝烟赌赃欺，其官兵干部待遇及服装也较国民党中央军简朴。延安当时呈现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阎也使秋林、克难坡的生活紧张化，二战区首脑部各机关干部除每日坚持八小时工作外，均须出席每日早晨6时在洪炉台前由阎亲自主持的“朝会”。凡此种种，容易使人感觉它是当时中国国内的“第三世界”。

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要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么也是错误的……”阎锡山同中共建立特种形式的统战关系，既然是以利用对方为出发点，共产党人怎么能够不对他提高警惕！事实上，从牺盟、决死队成立之日起，二战区内部抗日与投降、进步与倒退、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就一直不曾停止。到了这时，新旧摩擦日趋激烈。阎锡山眼看新军蓬勃发展，日益壮大，惟恐不为己用，又感旧军军官腐败无能，统驭无方，士兵情绪低落，自己存在的基础也将动摇，恨铁不成钢，便又参照中共“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一度提出过“新能存在、旧必灭亡”的口号，用以激励旧军军官振作奋发，整顿旧军，削弱新军。而作为牺盟和新军领导人的梁化之，唯阎锡山马首是瞻。当时，窃据民青常委及战区政治部组织课课长要职的张亦山炮制了一个“组织上纯洁，政治上进步”的口号，梁化之十分欣赏这个提法，并代他作了透彻解释：“不求组织上的纯洁，只讲政治上的进步，结果也就没有我们自己，全变成共产党的力量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已在酝酿、准备、实行由“联共抗日”到“反共降日”的策略转变，直到1939年12月间晋西事变发生，终于把事态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晋西事变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成为二战区的主要方

针，但阎锡山利用中共办法对付中共之做法仍然继续，只是改为阉割曲解、断章取义、偷梁换柱、借瓶不借酒等阴险手法，依其所需不择手段罢了。中共历来强调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阎锡山仿佛从中进一步悟到枪杆子的特殊作用，打算使旧军达到纳粹铁血团的水平，成为消灭新军、抗击八路军的基本依靠。就在晋西事变发生的前几个月，阎在同志会内秘密组成一个军人核心组织——铁军组织（三三铁血团），指定28名高级将领为发起人，先发展中、上级军官，再到下级军官及政工人员，要求每个成员必须具有钢的志气、胶的团结和铁的纪律，必须以生命付诸组织，与组织共存亡。以这批人为核心，作为贯彻其反共军事路线的支柱。

中共历来将锄奸、防特、保守机密一类工作概括为政治保卫，牺盟会亦然。国民党对此称作“绥靖”、“保安”、“防共”、“肃伪”等等。而阎锡山则借用了中共的提法。1940年春晋西事变的军事行动停息之后，阎即令同志会内的特务组织敌工团派出“突击团”，并着敌工团协同同志会成立“安抚振济团”，到晋西各县清理牺盟遗留影响，迫害参加过牺盟的青年男女及新军家属，后把矛头对准中共地下组织。阎正式提出实行“政治保卫”口号，并将敌工团（第二战区敌区工作团）特务组织改称政卫团（政治保卫团），把中共的口号变作反共的旗号。晋西事变后，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部下议其投敌，阎欲加以整饰控制，于1941年秋举办第一期“洪炉”训练，以“负责、迅速、深入、彻底”八字为会训。阎在洪训期间提出“志会长之志，言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同时标榜造就人才，培养干部，对中下级组、政、军、经、教干部分期调训。阎屡屡盗用斯大林首创而为共产党人惯用之“干部决定一切”这个著名的口号，在第一期洪训中



进行了妥协投降的思想动员，正式提出“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投降理论，公然把列宁对反革命作斗争需要讲究策略的名句，作为粉饰他通敌卖国的借口。

中共在对敌斗争中历来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注意争取失足者，不牵涉无辜，对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作宽大的处理，只是镇压坚决的反共和反革命分子。阎锡山和梁化之也曾盗用过宽大政策。1943年3月，梁化之以特务起家后，鉴于杨贞吉特务系统乱捕乱杀，非但未能肃清“伪装”，反而把老百姓逼上梁山，于是标榜“自首、宽大、不杀人”的自首政策，意欲发动地下革命工作人员自首，对中共叛徒给予宽大待遇，此举曾起到一定的欺骗作用，使晋西各县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阎锡山把梁系“以伪肃伪”的办法总结为“明利害，断归路，表效用，辟前途”的成套“肃伪”经验并加以推广。由此可以看出阎利用中共办法对付中共的险恶用心。

中共多年来从事革命活动，始终强调党的领导；采取党领导政府，党指挥枪，在地方则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阎锡山从中找到“窍门”，提出实行“组织起来的组织领导”，由同志会统一领导二战区的各项工作；当时阎身兼同志会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与山西省政府主席等数项要职，但他以“同志会会长”为最高职务，他把手下的同志会高干，分为什么“首席高干”、“军政高干”、“行政高干”、“建军高干”、“经济高干”、“财政高干”、“开展高干”、“兵农高干”、“不兼职高干”，分别负责领导各方面的工作。“高干”之下又有数十名“干委”和数百名“基干”，统治着10余万“会员”。阎在同志会内采取特务统治办法树立个人威信，提出“领袖至上，组织至尊”的口号，要求部下于集体场合见阎出来，均须齐声高呼：“敬爱会长”、“服从会长”、“会长健康”、“会长万岁”。这就使同志会内部笼罩着浓厚的法西斯气氛。

1942年，延安进行整风运动，中共党员通过检查思想，检查工作，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在此之前，经常检查思想，提高认识，改进工作，在党内已养成习惯。阎锡山从中联想到：要是能使所有部属经常处在“考虑是否做了对不起会长和组织的亏心事”的反省状态中，就有利于他进行法西斯统治。阎锡山对反动事业有其长计划和短安排。当时，在克难坡，每日早晨要举行近一个小时的例行“朝会”，二战区首脑部各机关人员出席，内部是由阎或其高干布置当前工作。在“朝会”仪式中特别规定了一项“自省”（数分钟），就是让所有部属静默考虑和扪心自问“是否做了对不起会长和组织的亏心事”，使人们服服帖帖听任阎锡山摆布。要是有人不诚心反省又确实做了“对不起会长和组织的亏心事”，那该怎么办？“会长”早已想妥了办法，就是让他“自裁”。

1943年间，晋西生产萎缩，市面萧条，物资奇缺，物价波动。阎锡山为了挽救二战区的经济危机，提出一套“以互助合作为中心，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交换和消费，取消私商，消除中间剥削，统一管理市场，稳定物价，保障人民生活”，“发展生产力，实行自给自足的管理经济”的方针。在此之前，解放区各地早已建立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综合性的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上起了很大作用，阎锡山明知边区的合作社作用不小，但不愿落个“依样画葫芦”，遂标新立异提出成立合作供销社，并将“合作供销社”一竿子插到县、区、乡、镇，凭借政权力量，以合作供销社取代私商，掠夺商人资金，操纵物价，控制生产、交换和消费，垄断对外贸易。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根本没有刺激生产，繁荣市场，而是通过对百姓盘剥，对共方苛虐，与敌伪勾结，听由官僚资本进行投机倒把而牟取暴利。当时我在隰县战工

团团部工作，亲眼看到阎用一道道命令取消私商，勒令停业，以及实行“限价”，掠夺商人货物，逼得隰县城内许多商人叫苦连天，走投无路，对阎的做法恨之人骨。阎锡山则把这种反动措施美其名为“新经济政策”。众所周知，新经济政策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共在一段时间内所实行的革命政策。又如，阎锡山了解到解放区农村生产正规，秩序正常，主要是由于民兵不脱产，平时种田，战时打仗，亦兵亦农，劳武结合的效益。为此，他呕心沥血想出一个“兵农合一”的名堂，并伙同他的顽固高干薄右丞设计出一套坑害老百姓的办法。从1943年冬开始，二战区所辖各县全面推行“兵农合一”暴政。他们在农村强迫实行“编组份地”，被抽派确定的人营壮丁不愿充当反人民的炮灰，留在土地上的国民兵除了交纳公粮和优待粮花以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差务徭役与苛捐杂税，终年劳动，不得自饱，逼得农民走投无路，形成田园荒芜，市面萧条，农民厌耕，士兵厌战的不景气现象，从“兵农合一好，遍地是荒草”的民谣，就可以看出民心向背，它同解放区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情景恰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292

解放区各地每年都要召开劳模大会，表扬奖励劳动模范，鼓励他们在群众中起带头作用、桥梁作用、骨干作用，来推动工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对于这件事，阎锡山也要学着搞。当时，延安表扬、奖励农业劳模吴满有，阎锡山在吉县就表扬奖励农业劳模吕存恭。在反动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不可能从农民中自发地产生大批劳模，阎锡山只可用行政手段来制造、培养个把典型，作为迷惑和笼络“受苦人”的模特儿。他煞费心机，访查物色到吉县五龙宫村一个叫吕存恭的老农，此人干活踏实，作务庄稼有些经验技术，种地产量较高，阎锡山就对他加以重视与培养。1944年秋天，吕存恭赶着毛驴驮了两颗有六七十斤重的大南瓜到吉县城给“会长”报喜，阎欢喜不尽，特意将这两颗大南瓜陈列在表

扬奖励吕存恭的劳模会上展览。殊不知一个吕存恭和两颗大南瓜，对于解决“遍地是荒草”的问题，根本无济于事。

阎锡山和梁化之一向认为善于宣传是中共的一个特殊本领，觉得“天下少有比共产党会说的，翻过来折过去都有理”。所以他们也狠抓这一条，他们之重视宣传是和蒙蔽群众的主观愿望分不开的。在晋西时期，阎锡山的反动宣传工具有同志会的《革命生活》、铁军组织的《铁军魂》、军官服务队的《海中孤岛》、战区政治部的《战时政治》、理论研究院的《理论研究》、《阵中日报》、民革通讯社、民宣队、歌剧队，以及中央社分社与国民日报，这些宣传机构的惟一任务就是制造反革命舆论，开展对中共进行造谣诬蔑的竞赛。1944年冬，延安改进文风，提倡文艺作品的通俗化、大众化，《解放日报》副刊上不断登载有通俗化的文艺作品，与阎府关系密切的御用文化人刘克也出来搞通俗化的文艺作品，仿照延安文体写成文艺作品，登载于《阵中日报》副刊，加以推广。同一时期，同赵宗复一道代表二战区参观延安归来的徐上珙，热衷于介绍延安的秧歌舞。徐经常亲往民宣队、歌剧队排练教演，一时在吉县城内兴起了秧歌舞。阎锡山及其幕僚不仅直接开办谣言工厂，对中共进行造谣诬蔑，而且盗用中共的宣传方式为反宣传活动服务。

中共实行自己的路线政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阎锡山及其幕僚利用中共的办法对付中共却遭到彻底的失败，这是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田中峻)

#### 四 阎锡山的“洪炉训练”与反共投敌活动

1939年2月至3月间，阎锡山在陕北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第

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亦称秋林会议），其目的就是要消灭新军<sup>①</sup>，扩大旧军，为其进一步反共投敌做准备。然而这一奸计未能得逞，便酿成了“晋西事变”——十二月事变。

“晋西事变”，阎锡山所下的赌注是很大的，仅在晋西北、汾西地区就集结了几个军的兵力：以赵承绶的骑兵军与郭挺一<sup>②</sup>所率领的工人武装自卫队袭击驻在晋西北的抗日决死四纵队，以王靖国、陈长捷所属的第十九军、六十一军袭击驻在汾西地区的抗日决死二纵队。他们紧密地配合国民党军队侵占陕甘宁边区的企图，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晋西事变”后，从军事上说，阎锡山损失折将，惶惶不可终日；从政治上说，阎锡山的什么“统一战线”、“抗战救国”、“民族革命”的假面具都被彻底戳穿，失掉了迷惑人、欺骗人的作用。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阎锡山便横下心来，决心沿着反共投敌的道路走下去。但是，他既慑于抗日决死队的威力，又怕进步舆论的谴责，更觉得内部的人心不齐，军心各异，便不敢贸然从事，公开投敌。这就是阎锡山举办“洪炉训练”<sup>③</sup>的历史背景。

294 洪炉训练委员会是专为这次训练干部成立的组织领导机构。其规模之大，训练人数之多（党政军经学干部二万多人）是空前的。阎锡山自任会长，赵戴文<sup>④</sup>为副会长，同志会的高干均为委员，并轮流担任洪训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之下的组织形式，有

① 新军——指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新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亦称抗日决死队，由薄一波、韩钧等同志领导。旧军——指阎锡山一向统领的军队。

② 工人武装自卫队队长

③ 即暑期进步训练。洪炉训练委员会即暑期进步讨论会。1941年暑期举办的，简称“洪训”。

④ 当时山西省政府主席，民族革命同志会副会长。

大队、分队、小队、小组。各层的负责人均为基干。“洪训”的时间是1941年夏，地址即在阎锡山司令部所在地——吉县克难坡。“洪训”的主题思想是“整体精神”。训练方式以大会报告、小组讨论为主，也举办一些辩论会、讲演会什么的。大会的重要报告，小组的讨论记录、辩论结果、有关文章，均摘要刊载于《洪炉周刊》，分发到队部、小组，作为学员的阅读材料。

所谓“整体精神”，即志会长<sup>①</sup>之志语：“整体精神”就是要大家紧跟阎锡山一起反共投敌。

“洪训”就是向参训人员做投敌的政治动员，让大家做好投敌的思想准备。

“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阎锡山在“洪训”中一再强调这个口号，这正是给他的反共投敌制造所谓理论根据。说得明白一些，阎锡山的意思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投敌，才能“存在”，能“存在”，才能斗争，斗争胜利了，不就是维护“真理”吗！投敌是“存在”的需要，有关生死存亡的选择，取生存，不就是最大的需要，最“合情”“合法”的嘛！

阎锡山为了欺骗参训人员，还编写了一首“洪训”歌，大唱特唱，歌词为：

高山大河，化日薰风，俯仰天地，何始何终；  
谋国不预，人物皆空，克难洪炉，人才是宗；  
万能干部，陶冶其中，人格气节，革命先锋；  
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  
自动彻底，职务唯忠，抗战胜利，复兴成功。

<sup>①</sup> 指阎锡山，他是民族革命同志会的会长。

这是多么冠冕堂皇的歌词，什么“人格”啊，“气节”啊，“抗战”啊，“复兴”啊，而骨子里却在做着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唱这首歌的真实意图，仍在于强调“精神整体”、“决议是从”。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真一套，假一套，乃是阎锡山欺骗人民、欺骗干部惯常使用的伎俩。

阎锡山深知宣传的重要性，在“洪训”期间，特别强调“传热”。所谓“传热”，就是要让受训人员把“洪训”中所受的“热”——对主题的领会、感受，负责传达给所在单位的未受训者，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他把每一个参训人员都看成一粒“种子”，他有个形象的比喻：一颗谷子，（变成）一穗谷子，（变成）遍地谷子。他还指定《阵中日报》开辟“传热”专栏，扩大影响。

阎也深知反共投敌是不得人心的，于是在“洪训”期间，派遣特务深入各个队部、小组，大搞特务统治活动，并责令参训干部互相监督，互相检举，公开的口号是“不容人不能”，“能使人能”；“当个教员，教育逢人，当个警察，管理逢人”。阎派特务的方式也是费过一番苦心的。他命令检点参事徐培峰组织了个“服务士队”，以担任清洁卫生、勤杂事务为名，安插在“洪训”的各层组织中，窃听受训学员的言论并监督其行动，密报徐培峰转报阎锡山。其中严重的定为“炉碴灰”，有的处死，有的服劳役，搞得一些人不知下落。其中一般性的，事不论大小，他都要当面把密报的情况，告诉给本人，以显示他对每个干部事无巨细，“洪训”期间，阎锡山为了加强控制干部，便大事发展组织。同志会从会员中发展“同先”（同志会先锋队），从“同先”中发展“基干”。铁军组织则发展“铁军”，“民众进步社”<sup>①</sup>则大开香堂广收

<sup>①</sup> 阎锡山“洪门”组织，对内称“民众山”。阎锡山自称山祖。

洪门弟兄，敌工组织也乘机发展特务人员。当时人们一般要参加阎的三个组织，大家管这种做法叫做“三道箍”，“箍”住你必须跟阎锡山走，否则就让你尝尝铁的纪律的滋味，勒令自裁。

“洪训”第一期结束后，阎准备投降日军的活动就逐渐明朗化了。日军占据的孝义城<sup>①</sup>已经让给阎锡山，阎委派党政军各级干部到达孝义，开展工作，并特派他的参谋长楚溪春到孝义指挥一切。

阎锡山原定1942年春回太原。敌伪人员已在太原筹备召开欢迎“阎长官”的大会，各县各村的伪县长、伪村长也准备前往参加（曾问过几个当时在太原的人，也都说确有迎阎的活动），可被通知开会的人还未到达太原，便又停止欢迎了。

为什么停止欢迎？原来是这样的：

日阎合流，本已水到渠成，但国际形势的突变，是出于阎锡山的意料之外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太平洋偷袭了珍珠港，国际局势有了显著变化，蒋阎合演的双簧——曲线救国，也必须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变化。1942年1月，蒋介石派贾景德<sup>②</sup>亲往克难坡密谈。当贾景德路经陕北秋林时，大雪纷飞，山路崎岖，本难行进，可贾身负重命，不便拖延，雇一骡驮软轿，冒雪而行。行前，《阵中日报》记者去见贾，贾当然不能以真情相告。经阎贾密谈后，日阎合流，暂时冻结。他们须再看大局，待机而行。

297

这时，阎日勾结，又由公开转入半公开阶段。到1942年5月6日，阎锡山亲自参加了与日军密商投降的“安平会议”<sup>③</sup>。

① 1937年冬即被日军占领，它是晋西通往太原的要道。

② 当时在重庆任国民政府铨叙部部长，阎锡山抗战前绥靖公署的秘书长。

③ 安平会议——安平是乡宁县的村镇，日阎会谈于此，人们称之为安平会议。



会后，阎锡山高唱开展“晋西大保卫战”，实际上是加强了“肃伪”活动。阎的所谓“肃伪”，便是妄图肃清晋西的地下共产党。此后，阎日不时互派代表，秘密进行交易。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阎日伪勾结反共，便成为很自然的事了。

(牛青庵)

## 五 阎锡山的特务组织及其活动

阎锡山的特务统治是非常残暴的，仅就见闻所及，将阎锡山自抗日战争开始后至山西解放前的特务组织及其活动，作一简要的叙述。

抗日战争初期，阎锡山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打起与共产党合作抗战的幌子，暂时参加抗战。但抗战一开始，他就抱定了“抗日准备投日，联共准备反共”的老主意，提醒他的部下说：“日本并不是真正的敌人，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敌人。”

### 成立特务组织“敌工团”

1938年阎锡山就密令杨贞吉成立了特务组织“敌工团”（敌区工作团）。他这里所说的“敌”并不是侵入我国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坚决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中国共产党。

“敌工团”成立后，即以晋西吉县为中心划了一个专区，作为其特务活动的基地，派杨贞吉为专员。为了培养训练特务人员建立特务武装，阎锡山还授权杨贞吉成立了由“敌工团”主办的“随营分校”和“宪兵分校”，并成立了两个“政卫师”，一个“政卫旅”，几个“政卫总队”，还委派杨贞吉兼任了他的内卫处处长。阎的侍卫队、内勤队和一切警卫人员，由杨贞吉统一指挥。在

“肃清伪装”、“净白阵营”的口号下，杨贞吉把当时在二战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决死队，以及工、农、青、妇等一切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一律诬蔑为“伪装分子”，加以逮捕、监禁、毒打和杀害。在阎锡山首脑部所在地吉县克难坡附近的宋家坡，以及其他几个地方，还设有专门拘押、审讯抗日进步人员的“集训队”。据极不完全的统计，在抗日战争时期，仅在宋家坡集训队中拘押和迫害的即有 2000 余人。

### 人人自危的对内特务统治

“晋西事变”之后，阎锡山为了加强对内的特务统治，内部也成立了许多封建法西斯组织，除了“民族革命同志会”以外，还成立有“铁军组织”（也叫“三三铁血团”）、“文人组织”（也叫“最后组织”）、“忠贞保证组织”、“进步社”（即“洪帮”）、“安清委员会”（即“青帮”）等等。通过这些组织，使他的各行各业的大小文武官吏都分别受到控制和约束。阎锡山则自封为这些组织的太上皇，名之曰：“会长”、“山主”或“老前人”。这些组织都有极森严的“纪律”，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志会长之志”、“言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不能有个人自由。“会长至上，领袖至尊”是这些组织的最高纪律，如有背后对阎锡山诋毁、诬蔑或不满的，一律实行“自裁”（即强迫自杀），并规定如有背叛阎锡山及其组织者，任何人都可以当场打死。

凡参加上述组织的人，“终生不能脱离”。还规定了什么“不容人不，能使人能”，“循环检举”，“突击密报”等许多互相监视、互相检举密报的办法。阎锡山经常教训这些组织中的成员说：“纪律如火坑，谁忽视，谁毁灭。”说对这些组织实行如此森严的控制，是为“堵监狱之门”、“断杀场之路”。阎锡山为了对内造成所谓“天罗地网”，做到到处有他的耳目，还建立了“服

“服务十”制度，即给各级军政负责人员都派去“服务十”做警卫或勤务人员。这些“服务十”都有直接与阎锡山见面、通讯和通电话的“特权”。阎锡山在自己跟前设有“服务十”办公室，专门承办这些“服务十”的电话、信件以及同阎锡山见面的事。阎把这些“服务十”称之为“会长的化身”。这就使阎的系统内部互相监视、人人自危的局面更为加剧。

### 晋西特务“大扫荡”

1942年，阎锡山在晋西发动了一次掩耳盗铃的“晋西大保卫战”，目的是掩饰他对日投降的真面目，并在其晋西统治区内开展了一场对地下革命组织及一切抗日进步群众的“大搜捕”和“大扫荡”。

这场“大搜捕”和“大扫荡”是从“隰汾区”开始的。阎锡山把他所统治的晋西各县划分为五个“战地动员工作区”（简称“战工区”），各区设有“战地动员工作委员会”（简称“战工会”），每个“战工会”之下，直属一个“战地动员工作团”（简称“战工团”）。这五个区即：乡宁、蒲县、隰汾、孝义、石楼。“隰汾区战工会”的负责人员是特务头子梁化之。梁把在“晋西事变”前隐藏在牺盟会组织内部进行破坏活动，以后跑到重庆去的张亦山叫回二战区，随他到“隰汾区”专门进行特务工作。他们直接指挥“隰汾区战工团”所属队伍，在隰汾区所属隰县、汾西、永和、大宁、灵石等县对共产党地下组织和“晋西事变”以前参加过牺盟会及其他抗日救亡组织的广大爱国青年和进步群众，进行了极其残暴的搜捕和迫害。

他们对被捕的群众实行严刑拷打，使无数人神经失常，或成为残废。同时，他们还采用各种阴险狡猾的手段，强迫被扣押的人互相监视，并派遣特务人员伪装犯人，从中进行挑拨离间，使

犯人互相猜疑，互相对立，并且还实行“以伪肃伪”的阴谋诡计。

1944年间，“战工会”和“战工团”取消后，梁化之和张亦山即在原“隰汾区战工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专门的特务组织“流动工作队”（简称“流工队”）。总队部设在隰县康城镇，在各县普遍成立了“流动工作组”（简称“流工组”）或“流工联合组”，并且又成立了专门进行监押和审讯工作的“真理辩证处”。同时还成立了专门进行特务训练的“流工实习队”和特务武装组织“流工支队”。随后，又在阎管区的“南区”（当时阎管区将吉县以北各县称为“北区”，吉县以南各县称为“南区”）的中心乡宁县成立了“流工队南区办事处”、“南区真理辩证处”和“南区流工支队”，在汾南成立了“汾南流工队”，汾东成立了“汾东流工队”，这样使流工队的特务工作，由原来的“隰汾区”，进一步扩展到了阎锡山所控制的其他各地，并且与日伪勾结，伸展到了汾河以南和汾河以东的解放区内。在“南区”照样开展了“大搜捕”和“大扫荡”，在汾南汾东进行了他们力所能及的破坏活动。

阎锡山为了加强特务统治，除了到处建立和扩大特务组织以外，还在每个专区和县的“统委会”（统委会是阎在各专区和各县实行统一领导的所谓“组、政、军、经、教统一领导委员会”的简称）中，设立了专门领导和指挥特务工作的“肃伪专委”，建立了由专到县的特务领导系统。

### 从“流工队”到“特种警宪指挥处”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阎锡山回到太原。原在晋西由梁化之领导的特务组织“流工队”，回到太原以后即改为“特种警宪指挥处”，原来协助梁化之在“流工队”实际负责的张亦山，因搞特务有功被委任为驻太谷县的第一区专员，而以徐端继承了

张亦山的职位，担任了“特种警宪指挥处”的代处长。

特种警宪指挥处比流工队时期规模更大，也更加残暴。它附属有特种警察大队、特种宪兵大队以及其他特种武装部队，有专门培养和训练特务人员的特种干部训练班和特种干部招待所。在太原、大同、临汾均设有“特种警宪工作队”（简称“特警队”），在各县均设有“宣慰组”（即“特警组”，每县一二十人不等）。此外，还在太原设有两个新闻通讯社（一个叫黄河通讯社，一个叫华北通讯社）、一个银号（名叫“正心诚”）和一个专搞物资交流的经济机构。他们利用上述各种新闻和经济机构，分别对文化界、青年知识分子及其他各界进行秘密的特务活动，并对解放区进行各种经济和政治的破坏活动。

除了这些公开的和半公开的特务组织以外，还有两个非常严密的秘密特务组织——“晋风社”和“特工会”。“晋风社”专门以各中等以上学校的青年学生为对象，发展“特务细胞”，开展特务活动，是1947年春季成立的，由太原特警队队长李紫云和秘书韩清溪负责，以组织青年学生进行学习和文化娱乐活动为名，诱骗各学校学生参加，为他们搜集情报，进行特务工作。1948年“华北通讯社”成立后，这个秘密特务组织便在“华北通讯社”的掩护下进行活动。“特工会”是特种警宪指挥处所属特务系统内的一个特务核心组织，参加的对象是特务人员中和由他们所利用的青年中的“骨干分子”，有极严密的组织系统和纪律，如有泄露其组织秘密或背叛其组织者，一律处死。

特种警宪指挥处是阎锡山特务组织中最凶恶最残暴的一个。他们控制了阎锡山统治下的所有工厂、学校及每一个城市和乡村，逮捕、杀害了无数地下革命工作人员、进步青年和劳动群众，使阎锡山特务统治达到穷凶极恶的地步。1947年之后，阎锡山又开展了惨无人道的“三自传训”，更把法西斯恐怖扩展到

了广大农村地区。

阎锡山特务的罪行实在是罄竹难书。上述一切，仅笔者见闻所及的部分概述而已。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前，在阎锡山的统治区，完全是一个特务统治的人间地狱。特务头子梁化之及其帮凶——特种警察指挥处代处长徐端、副处长兰风、李紫云以及主持平遥县“三自传训”的罪魁尹遵党、吴春台（当时尹系平遥专区专员，吴系平遥专区同志会区分会主任）等，由于恶贯满盈、自知不可能逃脱人民的惩处，在临解放时畏罪自杀，阎锡山的另一个特务头子杨贞吉等解放后受到了人民法律的严厉制裁。

（智力展）